
从日本文坛看日本军国主义思想 及侵华“国策”的形成

王向远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文坛、日本文学家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及对华侵略“国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较早表述对华侵略设想,或为侵华制造理论根据的,是明治维新后在野的一批文人和作家,如福泽谕吉、中江兆民、冈仓天心等。他们的思想是北一辉、大川周明等现代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坛上有更多的人,如保田与重郎、武者小路实笃等,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谋士和吹鼓手。这些人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和看法,以及他们提出的对华侵略的思想和主张,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对日本侵华“国策”的施行,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择其主要代表,试作如下剖析。

一 福泽谕吉:“文明战胜野蛮”

明治维新以后,最早关注中国问题,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状做出自己的独特分析的,是日本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福泽谕吉(1834—1901)。作为文学家,福泽谕吉为创造日本近代的平易畅达、富于宣传效果的评论、政论和随笔散文等诸种文体,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以这样的文体,写出了大量的作品,他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和现状所做的分析,他那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侵略意识的中国观,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人的中国观,对于日本历届政府对华侵略政策的制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对中国的看法标志着日本

传统的中国观的终结,并为日本近代的中国观奠定了基调。

福泽谕吉在他的《文化论概略》(1875)一书中,以西方的进化论为思想基础,把世界文明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个档次。他说:“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最野蛮的国家。”在这里,福泽谕吉还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了同一个档次,称之为“半开化国家”。但是,要知道,在古代,除了极个别的人(如江户时期的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文学家们对中国充满着友好、景仰之情。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前,日本的近代启蒙还是以中国为榜样的。福泽谕吉之前,日本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是文明国。福泽谕吉则明确地从文明理论上把中国的“文明”档次降了下来,为他的文明理论的进一步展开做了铺垫。那就是,首先,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学习西洋并谋求加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从而成为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文明”国家,这也就是他后来提出的“脱亚入欧”;其次,日本现在有了“文明开化”的觉悟和条件,而中国没有,所以,虽然日本和中国一样属于“半开化”的文明,但日本的文明在这关键的一点上还是要高于中国的文明。“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思想是丰富的”。他的根据是:日本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是一个天皇的“至尊”与武士幕府政权的“至强”相配合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达不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日本比中国容易”(《文明论概略》)。而到了后来,福泽谕吉就干脆把日本看成是“文明”的化身,把中国说成是“野蛮”国家的代表了。

就这样,福泽谕吉把中国几千年来在东亚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否定了。那么,现在应由谁来做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中心呢,在福泽谕吉看来,日本正在成为西洋各国那样的“文明国家”,因此自然应该是当仁不让地成为亚洲的“盟主”。他明确提出,在“亚洲东方,

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论与朝鲜的交往》）。于是，他主张用武力向中国、朝鲜等国家输出日本的所谓“文明”；干预朝鲜事务，并使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主张和西方列强一起瓜分中国，割取中国的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他甚至画好了一张“支那帝国分割图”。他积极鼓动对中国清政府开战。当日本在“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胜利之后，福泽谕吉欣喜若狂，他在《福翁自传》中写道：“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取得的胜利，啊……多么高兴，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好。我活到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光荣的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多么想让他们看到今天的胜利，每念及此我都要掉泪。”他把“日清战争”说成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在“文明”的大义下同中国作战的，因此，在他看来，使中国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

福泽谕吉关于“文明”、“进化”的理论，关于武力侵略中国的主张，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头。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象征”的北一辉，在其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9）中，明确写着：“中国、印度七亿同胞，若无我日本之扶持与帮助，实无自立之途。”认为，为了把欧美“非法独占的大量领土”夺取过来，日本“有发动战争的权利”。其思想主张与福泽谕吉具有明显的联系。

二 中江兆民：“三醉人”的醉翁之意

明治时代另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中江兆民（笃介，1847—1901）以另一种更具有文学色彩的形式表达了和福泽完全相同的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中江兆民在他那著名的《三醉人经纶问答》（1886）中，设计了一种戏剧性的情节结构。“性酷好饮酒，又酷好谈论政事”的南海先生，有一天“把酒独酌，已入陶然步虚”之境，而就在此时，两位客人带着洋酒登门拜访。其中一人是“西装革履，眉清目秀，身躯颀长，举止潇洒，能言善辩”的“绅士君”；另一人

是“身材高大,手臂粗壮,面目黝黑,目光炯炯”的“豪杰君”。三人礼毕坐定,交杯换盏,纵论天下大事。

“三醉人”当中,“绅士君”是主张以文兴邦,认为“民主平等”制度是最完善的社会制度,世界各国迟早都要建立这种制度。而劣弱的国家,实现富国强兵之策没有指望,所以,还不如干脆放弃不及强国万分之一的兵力,撤去水陆军备,而致力于无形的“理义”、“学术”、“美术”,使强国尊而敬之,不忍侵犯。

与“绅士君”相对,“豪杰君”则慷慨激昂地赞美战争,他说:“争源于人怒,战源于国怒,不能争者为懦夫,不能战者为弱国”,“文明国必是强国”,“征诸古今史籍,昔日的文明国均为昔日的善战国,今日的文明国均为今日的善战国”。接着,“豪杰君”切入了主题:

在亚细亚,抑或在阿非利加,我时常健忘,只知有一大国,国名不记。其幅员甚为博大,甚为富饶,而又甚为劣弱。我听说此国有兵百余万众,但涣散不整,缓急均不能用;我听说此国虽有法度,但形同虚设。那是一头极为肥硕的牲牛。为天下众小邦所垂涎,待其充饥果腹也。何不速割其半,或割其三分之一耶?(中略)若割取彼邦一半,或三分之一归于我邦,则我邦必成大国。物产丰饶,人多势众,乃施以政教,可筑城池,可筑防御,陆可出百万精锐,海可泛百千战舰。我蕞尔小邦,一跃可成俄罗斯,可成英吉利也。

“豪杰君”还进一步从日本的内政方面说明队伍出兵侵略的必要性。他认为,人们身上均有“恋旧元素”,而“恋旧元素”好象癌肿,承平既久,癌肿就要扩散,因此,“国家若一声令下,挑开战端,二三十万之众,可立即集于麾下……割掉癌肿之处,莫若我忘记其名的阿非利加或亚细亚一大国也。所以我等二三十万癌肿患者,开往那一大国,事成则占地雄霸,且可打开那一种癌肿社会,事不成则横尸原野,名留异邦。为国割除癌肿,成效必得。此可谓一举两得”。

那么,“豪杰君”所说的“那一大国”是何指呢?不言而喻,指的就是中国。关于这一点,居于前两人之间,取中庸态度的“南海先生”在后来已明确地指出了。“南海先生”说:

豪杰君所说阿非利加或亚细亚那一大国。我不知其所指。但倘若那一大国在亚细亚，则应与之结为兄弟国家，缓急相救，互相帮援。若妄动干戈，轻挑邻敌，使无辜人民死于弹丸，尤非计也。若夫支那（当时日本对中国的蔑称——引者注），从其风俗习尚、文物品式、地理地势而言，亚细亚小国当与之修好，巩固邦交，勿以怨恨相加为妙。我国产品日益增加，及至货物丰盈，那支那国土广大，人民蕃庶，实为我国一大贩路，滚滚不尽之财源也。

可见，《三醉人经纶问答》与其说是讨论天下大事，不如说主要谈论的是中国。更明确地说，就是如何对付、掠夺和瓜分中国。“三醉人”的三种看法，表面看来互有不同，但实质是相通的。“豪杰君”杀气腾腾，说得最为露骨，对中国的侵略企图丝毫不加掩饰，直接了当地表达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绅士君”和“南海先生”表面上似乎不赞同他的看法，但其主张的实质与“豪杰君”并无多大差别。在“绅士君”看来，象中国那样的弱国干脆不必有自己的军备。那么国防怎么办呢？他没有明说，其实也不必明说，那就是后来日本人提出的由日本人来“保全”中国；“南海先生”不主张对中国动干戈，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应成为日本的资源基地和商品市场，成为日本的“滚滚不尽之财源”。

在《在醉人经纶问答》里的“三醉人”当中，中江兆民处在什么位置呢？我认为，“三醉人”是中江兆民三个不同角度的发言，代表了他对华思想的三个不同的侧面。换言之，“三醉人”加在一起就是中江兆民。总之，在这部作品里，中江兆民是把中国作为日本独立富强的手段来看待的。

三 冈仓天心：“日本的伟大特权”

如果说福泽谕吉和中江兆民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表达了对中国的军国主义意识，那么，冈仓天心则是从文化的角度表现了同样的军国主义思想。冈仓天心（1862—1913）是明治时代最早系

统研究东方艺术(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的艺术)的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但是,他对东方艺术的研究,并不是学院式的纯学术性的研究,而是带有强烈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色彩和倾向。他曾到中国作过艺术方面的考察和旅行。写了《支那游记》《支那的美术》《东洋的理想》《东洋的觉醒》等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和作品。

在《支那游记》中,冈仓天心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就是,“在支那没有支那”。他写道:“关于支那,本人最突出的感觉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而是‘在支那没有支那’。单纯说‘没有支那’,听者也许会嗤笑,换句话说就是,‘支那没有支那的共通性’。冈仓天心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江南和江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力图证明的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谁都知道,中国的南北方在风俗文化上是有一定差异的,正如日本的北部的北海道的风俗文化和东京的有所不同,是同样的道理。以此为依据来否定中国文化的同一性,无论如何不能不叫人“嗤笑”。实质上,这里暗含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逻辑:既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那由日本来分而割之,有何不可呢?

另一方面,他又在《东洋的理想》中,一开头就提出了一句提纲挈领的话:“亚细亚是一个”(或译为“亚细亚是一体”),极力提倡亚洲的一体化。既然在他看来连中国都不是一体的,那又遑论整个亚洲的一体性呢?原来,冈仓天心是要导出一个根本性的结论:亚洲应该是一体的,但是现在没有实现这个理想。那么,由谁来实现这个所谓“东洋的理想”,使亚洲成为一体的呢?在冈仓天心看来,当然非日本莫属了。

以研究东洋问题而自负的冈仓天心不会不知道,日本在历史上是中国和印度的学生,那么,日本有什么资格自告奋勇地来担当统一亚洲的使命呢?他认为:

在这复杂当中明确地实现这种统一,是日本的伟大特权。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流贯着印度、鞑靼的血,我们从这两方面汲取源泉。我们能够把亚洲的意识完整地体现出来,这是我们的

与这种使命相适应的一种遗传。我们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的无与伦比的祝福,有着未曾被征服过的民族所具有 的自豪,我们有着在膨胀发展中做出牺牲而坚守祖先留传下的观念和本能这样一种岛国的独立性,我们就能够使日本成为保存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储藏库。而在中国,由于王朝的覆灭,鞑靼骑兵的侵入,疯狂的暴民的杀戮蹂躏——这一切不知有多少次席卷了全土。在中国,除了文献和废墟之外,能够使人回想起唐代帝王的荣华、宋代社会的典雅的一切标记,都不复存在了。(中略)

就这样,日本成了亚细亚文明的博物馆。不,她远远高于博物馆,因为这个民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天性,这个民族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古老的东西,同时又欢迎新的东西。凭着这种具有活力的不二元论的精神,我们把过去一切理想的所有方面都保留下来了……

显而易见,冈仓天心的这一套理论的核心,就是以日本为核心,来统一亚洲文化。他打着弘扬亚洲文化的旗号,强调亚洲各国文化上的连带性,同时又把亚洲文化与欧洲文化对立起来,提出“欧洲的光荣,亚洲的耻辱”(《东洋的觉醒》)。正是这一套理论主张,成为日本现代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表面上看,冈仓本人并没有明确鼓吹对华侵略,但是,他又为对华侵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他的“亚细亚是一个”成为被军国主义当局利用来进行侵略宣传的一个著名口号,他们甚至把这句话刻在石碑上。在这句口号的掩护之下,对中国的蹂躏和占领成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义举,对中国的“三光政策”成了“宏扬亚洲文化”的圣战,侵华战争也被说成是把中国从英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战争”。半个多世纪以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在《建设大东亚秩序》(1943)一书中,把冈仓天心的话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亚细亚的复兴,并不只是意味着从欧洲的统治下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它同时也是在亚细亚诸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复活古代的光荣。而日本实际上正

在为这一庄严的使命而战。因为，东洋的好的东西，宝贵的东西，纵使其故国最终也已经成为一去不复返的伟人的影子，但在日本，今天却以生机勃勃的生命跃动着。（中略）今天支那和印度从我们的生命中所摄取的正是这种作为东洋精神的日本精神。”

四 保田与重郎：战争“是日本唯一的精神文化”

30年代以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体制全面形成，侵华“国策”也逐渐全面实施。与此相适应，日本文学界也全面军国主义化。大部分文学家加入了侵华战争——“大东亚战争”的宣传鼓噪中。其中，在理论上为日本的侵华“国策”鼓吹辩护最卖力、影响也比较大的，是保田与重郎和武者小路实笃。

保田与重郎（1910—1981）是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文学流派——“日本浪漫派”的居于指导地位的理论家。他的大量言论与著作，极力煽动日本人的非理性的狂热，故意使用别扭费解的语言，暧昧混乱的话语方式，来构建日本人对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国体”的非理性的膜拜。作为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家，他试图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寻找日本文学的血统。他认为，“现代文艺批评家的当务之急，就是……为了伟大的日本，而把‘日本’的血统在文艺史上列出谱系来。”（《一个戴冠诗人》）极力把日本的文学史说成是天皇“万世一系”的文学，证明日本文学的根本精神就是所谓“皇国文学”，宣扬“日本主义”和“日本精神”。作为法西斯主义文学家，保田与重郎主要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看待日本的侵华战争，而是从他“浪漫主义”的“美学理念”出发，把日本的侵华战争视为他所理想的“日本浪漫精神”的实现，极力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加以“文学化”和“美学化”，鼓吹所谓“作为艺术的战争”，把侵华战争本身看成是日本人的根本的“精神文化”。因此他认为日本出兵中国大陆是日本人在20世纪中采取的最“壮丽”、最“浪漫”的行动。

1938年，保田与重郎作为《新日本》杂志社的特派员，到朝鲜及我国东北、华北和北平、天津等地旅行，并写下了游记随笔评论

相杂糅的文集——《蒙疆》。这本书集中地表现了保田与重郎的中国观及法西斯主义战争观。他在北平看了故宫、万寿山,认为在中国已经丧失了唐宋文化的辉煌,断言北平是一个“颓废”的“废灭”的城市,而日本军的到来,却给中国带来美丽的生机。他极力赞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把卢沟桥看成是日本的“大陆发现时代的端绪”。在八达岭等处看到了飘扬的日本的太阳旗,则惊叹为“壮丽的浪漫的风景”。一路上,他贪婪地环视着美丽富饶的大陆,同时又不断构筑着日本吞并大陆的“浪漫”的蓝图。他写道:“我等如今要去北方旅行。在那里,日本毅然决然书写世界历史,从事着改变我们民族历史的伟大事业。况且我所走过的路线,将成为新的世界文化的最初的交通线路。我所走的,是大和民族对世界上的异国异族展示我们浪漫的日本而开拓的路线。现在是军队的进军的路线,不仅就将成为世界性的交通干线,成为世界文化的一大变革的据点。”“今日日本的国家、民族和国民的理想,是通过征战的形式来实现的。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越过宁夏,到达黄河的源头,到兰州去破坏赤色的线路呢?那个时候世界的交通线路就会发生伟大的变革。而这种行动本身就是日本的唯一的精神文化。”在这里,保田与重郎着重鼓吹的,就是使侵华战争成为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他写道:

大陆征战的结果,是〔日本〕国民的空想力和构想力增大了。这个时代创造力的衰退,莫过于毫无诗的天分的告白。如今日本的行动,比十九世纪法兰西帝国的行动规模远为宏大。(中略)这是世界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宏大。世界历史上的文化饕宴中的最大的地盘,正由日本人来开拓。我国现在进行的战争,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壮观的宿命。两洋文化的交流是二十世纪的理念。而这个理念的唯一实现者,就是东方的日本。因为,日本是亚洲历史的唯一的防卫者。同时,作为反抗欧洲侵略的亚洲的防卫者,用鲜血谱写开国文化的精神史的,也只有日本及日本人了。在这种世界文化的意义上,从日本的自豪感出发,国民支持这场战争。更有士兵们遵照大君(即天皇

——引者注)的敕令,以英勇无畏的历史的忠勇的谛观,从容赴死。这种雄伟壮丽的精神的风景,决不比明治的战争稍有逊色。

保田与重郎正是以这种狂热心态,构筑起了他称之为“浪漫主义”,实为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美学”。那就是把侵华战争精神化,把精神战争化。在他看来,最浪漫的东西,或者说最美的东西,就是战争,战争本身就是日本的精神文化,就是他的美学。在《蒙疆》的最后,他总结说:“严格地说来,所谓大陆,既不是地形也不是风土(不是地理学的现象),今天的大陆作为皇军的大陆,是严整的一体,因此它是象征的浪漫主义,它是新的面向未来的混沌的母胎。”

五 武者小路实笃:大东亚战争是“日本人的使命”

侵华期间另一个战争吹鼓手是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此人原本是日本近代文学中的重要流派——白桦派的代表人物。20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从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出发,曾一度采取了反战的立场,并写了反对日本军人屠杀台湾人的《围绕八百人的死刑》和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均在1915)。但是,到了后来,他逐渐地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1942年,武者小路实笃写了一本小册子——《大东亚战争私感》。这是一本赤裸裸地进行侵华战争宣传叫嚣的言论集。全书分为若干章,均冠以标题,如“日本的使命”、“日本为什么强大”、“日本人的慈祥”、“大东亚战争”、“克服死亡”、“未来东京的梦”、“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战无不胜”、“大东亚战争及以后的事情”等。在这部臭名昭著的书中,武者小路实笃对“大东亚战争”的所谓“合理性”,做了荒谬的论证。

在《日本的使命》一章中,他极力把日本说成是中国乃至亚洲的恩人和救星。他声称这本是写给那些“对日本不报好意的一部分亚洲人”看的。他要告诉这些人:“如果亚洲没有日本这个国家,那亚洲会怎样呢?”结论是:“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满洲肯定成了俄国的地盘。不光是满洲。如果没有日本,那么朝鲜不用说,

中华民国的北部就成了俄国的,南部就成了美英的了。”如果没有日本,他们(指中国、朝鲜等——引者注)无论怎么折腾,都将成为美英国家的盘中肉。或迟或早都会如此,不会有别的结果。只有日本国的存在,才能毅然站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从这种观点出发,武者小路实笃极力为日本的战争行径评功摆好。在他看来,日本为了和俄国争夺在中国的殖民霸权而进行的那场“日俄战争”,完全是为了东亚和中国;当时欧美人自视比亚洲人优秀,又倚仗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良的武器,欲把亚洲人当做是奴隶,而敢于对此提出抗议的,唯有日本。“他们之所以不能无忧无虑地从事邪恶的勾当了,就是因为有了日本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日本国看去虽小,但却不接受美英的蔑视。而且“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亚洲,只有日本是一个从来没有受到侵略的国家,因此他被人类赋予了特殊的使命。那就是“解放亚洲”,他希望亚洲人明白一个事实:“日本拒绝美英随心所欲地压榨亚洲,唯有日本一个国家能够使把亚洲的财富还给亚洲,使亚洲人不再作奴隶”;“这次的大东亚战争,就可以视为日本为完成使命而进行的战争。”所以日本人决不是只顾自己的国家,谁扰乱了东亚的秩序,就必须受到制裁。“对那些不得不向美英屈服的弱国,不能再让他们弱下去了。日本即使付出牺牲,也必须帮助他们。”所以他认为,亚洲“都得感谢”日本;“亚洲人要深刻地意识到,日本的存在,对于亚洲来说实在太幸运了”。“倘若日本失败了,那对于亚洲来说,对于东亚来说,都将是无比悲惨的。因此,亚洲人民爱日本,盼望日本取胜,是理所应当的”。

在《日本为什么强大》一章中,武者小路实笃把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等人的理论拾掇起来,大肆宣扬“日本主义”;宣扬日本人和日本国家的优越性。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强大,首先是由于日本的“国体”的优越。那就是:“日本国民全部都是天皇陛下的臣民,衷心奉仕天皇,万众一心”。人民为了天皇献身感到无上的光荣,所以在战争中涌现出了“特别攻击队”那样的为了完成任务而从容赴死的人。其次,日本之所以强大,还因为“日本人恐怕

是世界上拥有实干家最多的国家；这一点使日本人“在世界上出类拔萃”。日本人从不懒惰懈怠，“都是勤勉的国民”。在《日本人的慈祥》一章中，武者小路实笃认为日本人是“慈祥”的，而且，“越是慈祥越是强大，越是强大也越是慈祥”。在《克服死亡》中，武者小路实笃和保田与重郎一样，宣扬“死的美学”，他说：“人间有超越死亡的东西。我赞美为了超越死亡的东西而从容赴死。这是最美的死，也是超越生的死。”

武者小路关于日本强大的结论是：

日本人强大是天生的。日本人名誉心强，性格要强，吃苦耐劳。关键时刻敢于牺牲。我认为，决不苟且偷生的性格，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突击、肉弹（意即以肉体为枪弹，同归于尽的自杀——引者注）这些都是日本军队夺取最后胜利的原因。俗话说：断然前行，鬼神退避。日本人的这种断然前行是日本人的得意中的得意。敌人闻风而逃，空战时日本使用这种战法常常取胜。舍身的战法，这是日本从古代就有的战法，这种战法直到现在依然有效。

有个词叫如虎添翼。日本人的强大，就象老虎添了翅膀。武器齐备，精神昂扬，举国一致，拥有两亿人的巨人站了起来，所以强大。

作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武者小路实笃显然坚信日本必定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为此，他在《未来东京之梦》一章中还设想了胜利后的美妙情景。他写道：“东京是日本帝国的首都。这个帝都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亚洲第一文化中心地。”“东京是亚洲的军备的中心，学术文化的中心，东亚人如果不来一次东京，那就不能开口说话。”“在大东亚战争完成的同时，天皇陛下居住的帝都，必然成为亚细亚全体精神的中心。所以东京一定是亚洲第一的完全的城市。”

然而，事实证明，武者小路实笃盼望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罢了。

以上,笔者论列了明治维新后到战败前的约半个世纪中,日本文坛有代表性的5个人物的军国主义思想主张。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家在军国主义思想及侵华“国策”的形成和实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日本文坛上的这些人的言论在日本军国主义及侵华“国策”的形成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第一,从“文明论”、“文化研究”的角度,为军国主义的形成制造了理论根据;第二,站在“民间”和“在野”的立场上,和天皇制政府的侵华国策上下呼应,一唱一和,强化了“官民一致”、“一亿同心”的军国主义体制;第三,利用文学家的影响,将军国主义思想加以阐发,在军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普及中起了重要作用。弄清日本文坛与军国主义思想及侵华“国策”的这些密切联系,可以使我們更深入地认识对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更全面地了解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某些重要特征。

(作者王向远,1962年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